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下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097-3220-5

I. ①纪… II. ①中… III. ①五四运动-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61.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3099 号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下册)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刘玉清 王海荣 牛立明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220-5

定 价 / 159.00 元 (上、下册)

印 张 / 55

字 数 / 91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册

一 综论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耿云志 / 3
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	许纪霖 / 24
从大逆转到新思潮	陈方正 / 53
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论纲	梁景和 / 71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系统的建构	郑海麟 / 86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彭平一 / 103
五四运动后三十年知识界对五四观的重新审视	马克锋 田 耕 / 115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	俞祖华 赵慧峰 / 133
五四精神三思	何晓明 / 154
五四反孔的三点启示	李喜所 / 168

二 思潮

五四时期国人理想社会模式的转型	陈先初 / 181
《改造》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之传入	郑大华 高 娟 / 195

社会改造的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	刘长林 高晓峰 / 222
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面相	邹小站 / 246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五四与民族主义建构	王续添 / 268
五四新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	暨爱民 / 284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改良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冯兆基 / 304
现代中国激进主义之再思考	高力克 / 317
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潮及其反思	柴文华 / 333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李维武 / 341
论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	左玉河 / 364
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及其思想来源	坂元弘子 / 381
论中国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	何虎生 李晓雨 / 398
“主义”是如何战胜“问题”的	张 艳 / 412

下 册

三 人物与事件

鲁迅与五四精神	杨 义 郝庆军 / 435
胡适与吴敬恒	周质平 / 455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	刘贵福 / 478
“挽留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理纠结	马 勇 / 499
陈独秀：我们如何表达	孙 郁 / 521
钱玄同国学研究论析	李可亭 / 531
孙中山革命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与反应	张顺昌 / 552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何卓恩 / 568
五四时期的汪精卫	裴京汉 / 586

“明生”、“去闇”、“CZY 生”及其他	杨 琥 / 598
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	川尻文彦 / 618
从“五七”、“五九”到“五卅”、“五三”	臧运祜 / 642

四 其他

《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欧阳哲生 / 657
五四运动与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区域整合	彭武麟 / 681
五四与中国近代的废约反帝运动	李育民 / 695
五四上海罢工中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网络	邱 涛 / 712
五四时期超党派合作现象评议	张晓唯 / 733
五四知识阶层的人数与分布	朱志敏 / 743
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	李长莉 / 763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	张中良 / 785
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荣不必均摊	张宝明 王桂妹 / 803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喻春梅 / 818
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及其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邹振环 / 832
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	陆建德 / 852



三 人物与事件

鲁迅与五四精神

杨 义 郝庆军*

—

在距离 1919 年五四运动 90 年后的今日中国，重述鲁迅与五四精神的话题，我们已经拥有非常充分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实践上的时空维度。充分的时空维度，是把思想学术提升到一个新境界的极佳历史契机，我们尤应珍惜。鲁迅之于五四运动，向来被赋予“闯将”、“旗手”、“拓荒者”、“开山祖”等称号，借以表彰他在 90 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运动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如果单纯从鲁迅的文学和思想成就，或者从鲁迅所担当的历史责任及其产生的历史效果来看，这些称誉显然是恰当的，至少应该不算过誉之词。不过，倘要从鲁迅留存的文献材料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他的文字很少正面赞颂五四运动；倒是相反，在许多文章或书信中，鲁迅对自己亲身参与的五四传统能否继续下去颇感忧虑，他经常担心五四会变成权势争夺的砝码，成为某些人晋阶升迁的敲门砖，最终使五四精神消失在名利争夺的喧嚣之中。这方面有三点值得注意，可称为“鲁迅三苦恼”。

第一个苦恼是，有感于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名目。1925 年，在《热

*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郝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风》的“题记”中，鲁迅从卖报纸的穷苦孩子谈起，“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①从童子军的衣装变化，鲁迅发现了“投机家”借五四以获利；正是从这个历史细节中，他透视出五四运动的名目有被投机家利用之虞。

接着他谈到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的来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鲁迅之所以反感把五四运动称作“新文化运动”，原因就在于这个名目的词源，来自章士钊（行严）1923年8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上的《评新文化运动》。作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因1925年女师大风潮罢免鲁迅的佥事职务引发诉讼，成为鲁迅的论敌。因《鲁迅全集》1981年版对此词源失注，特此说明。鲁迅又由此引申说：“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②

1926年，在编辑杂文集《坟》之时，鲁迅再次提到“新文化运动”：“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③在此，鲁迅更加明确指出，把五四运动说成“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爱惜“新文化”，只不过是利用其名头，占据文化制高点，借以自炫；当五四运动“退

①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91～292页。

②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91～292页。

③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

潮”之后，他们又反过来开始嘲骂“新文化”，即鲁迅所说的“二次转舵”。

第二个苦恼是，鲁迅多次痛感五四精神的失落，因名责实曾发出“五四失精神”的感慨。1933年12月，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写下这样一段颇为触目的话：“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①曾任教于北大的鲁迅，此时攻击北大，称其“堕落”，态度如此峻急，言辞如此犀利，是何缘由？鲁迅在此信中说出这番话的现实语境是，五四时期曾一同在《新青年》共事的朋友钱玄同和刘半农二人此时与鲁迅失和，公开闹翻。在该信的前半部分，因《北平笺谱》序言之事，鲁迅向台静农发牢骚，历数钱、刘二人的不是；因二公当时都供职于北大，北大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自然令鲁迅回想起当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奋发精神，前后对照，遂令鲁迅产生了著名的“五四失精神”的感慨。

有人可能质疑，因个人恩怨迁怒于北大，进而怀疑五四精神的失落，是否是因为鲁迅心胸过狭，意气用事。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30年代，鲁迅从五四时代战斗过的朋友身上，看到了时代匆遽的变化，并切实感到真正的五四精神已经荡然变味。对于此点，在鲁迅30年代的信件中，可以找到不少材料加以佐证。比如，1930年2月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P字（即把北京的英文译名Peking改为Peping）。 ”^②又比如，1934年5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再次谈到《新青年》的同仁，谈到五四：“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③

所谓时移世易，朋友们都知道与世浮沉，赶搭一趟顺路车，而鲁迅却痛感五四精神的失落。这说明在鲁迅的心中，五四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同时也说明鲁迅与昔日战友们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已经愈来愈深，选择的道路也渐行渐远。

① 鲁迅：《致台静农》（1933年12月27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09页。

② 鲁迅：《致章廷谦》（1930年2月22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5页。

③ 鲁迅：《致台静农》（1934年5月10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6页。

第三个苦恼是，某些五四人物的作为，简直成了一种“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荒诞剧目。在鲁迅看来，五四运动造就了一批文化反叛者，他们揭竿而起，进行文学革命和社会改造。多年之后，这批文化反叛者由社会边缘逐步进入权力中心，取得了话语权，掌握了文化要津，成为一种新的支配力量，变成了另一种权势存在。有的文化人即便退居宁静的书斋，从事职业化的知识生产，其实也生产着一种新的文化权力。他们用这种文化权威再生产出支配关系，参与社会主流意识的生成，悄然进入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产生另一种社会控制和压制力量。

这样一来，当年五四运动中的叛逆动机便变得十分可疑。1934年，鲁迅引用宋人庄季裕《鸡肋编》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看取十五年前的那场拼斗：“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①似乎当年的叛逆，成了一条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和名声的终南捷径，成了一种以此名目交换彼名目，又受招安又卖酒醋的生意经。

看到刘半农用打油诗嘲笑写错字的考生时，鲁迅又回忆起五四：“五四运动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接着他感慨他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有中学生把“留学生”错写成“流学生”，就作诗嘲笑：“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鲁迅说：“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②在这里，五四同样成了向上的阶梯，那些“战士”踏着它，爬上了高位，但当年极力提倡和维护的白话文，却受到冷落和嘲笑。这在鲁迅的经验中，这种状况让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夹杂着诸多感慨。

① 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② 鲁迅：《“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第5卷，第334页。

二

那么鲁迅难以拂去的“三苦恼”根源何在？根源不在于非议五四精神，而在于坚守和发展五四精神。坚守和发展于心之切，故苦恼生焉。一场伟大运动的高潮初退，唱颂歌者可能是在功劳簿上抢座次者，苦恼者反而可能是运动精神执著而深刻的守卫者，这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者的精神史为证。鲁迅对五四精神是心中有数，尽管他无事过分张扬。鲁迅认为：“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因为传统厚积的古国，若不经一番深刻的历史理性和现代意识的批判，“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①，废物就挤压新生命的生长空间。鲁迅也很清楚，五四只是个“开端”，并未能毕其功于一役。

扫荡废物，催生新生，这就是鲁迅所概括的五四精神。对于这种精神的实绩，鲁迅着重讲了两点：一是提倡白话文，二是开创新文体。他认为：“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②白话文—思想革新—社会革新运动，鲁迅只是把五四作为中国现代转型中率先的环节，并不认为文化思想启蒙就能包打天下。对于文学价值和文学体裁的创新，鲁迅说：“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③又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

①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3-244页。

②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页。

③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第382页。

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① 鲁迅是强调五四文学价值的重构和文学体裁的创新，是受外国文学的启发的。同时他又说：“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介绍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② 这意味着五四时代并非经典的时代，而是探索问题的个性活跃的时代。因此，五四是伟大的，也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和伟大的未完成。未完成之时即出现“五四失精神”，这是鲁迅深为忧虑的，但鲁迅的忧虑不是期待人们把五四神圣化，而是期待人们发扬五四“扫荡废物，催发新生”的精神，去开拓中华民族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面创新和全面振兴之路。

三

在阐释五四精神时，鲁迅用了扫荡“废物”而不是扫荡笼统言之的“旧物”，思想革新要革除“腐败思想”而不是革除笼统言之的“旧思想”，这都是煞费斟酌，蕴涵着深刻的历史理性分析精神的。他对废物和腐败思想深恶痛绝，认为它们足以“活埋”新生机，使社会变得坏而又坏，这有他亲身经历的民元以后和五四以后的历史为证。分析是为了对之击中要害。1925年，他对许广平谈到，民元时期的中国还有希望，但“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③ 这里的“坏而又坏”，自然包括五四之后。因此，在他看来，五四精神不是一个恒定的抽象理念，需要以一股韧劲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洞察其根本而把握其实质。

首先我们注意到，鲁迅坚持五四的启蒙立场，而启蒙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对中国精神的反思，尤其是对儒道重等级、贵柔弱思想的长期沉积效应的反思，从而引发改造国民性的命题。他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④ 鲁迅不是静止、孤立地而是动态地以晚

①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② 鲁迅：《“论语一年”》，《鲁迅全集》第4卷，第568页。

③ 《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④ 《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清民国初年的改革进程考察国民性的，因而他的改造国民性命题属于民族改革自强方案的范畴，旨在以否定性思维排出沉积的废物，重新激活中国文化的现实功能，为历史主动精神的焕发寻找新的精神空间。

有人认为，“国民性”是一种西方话语，鲁迅承担了批评和改造“国民性”的责任，是屈从了西方传教士开创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神话，而这个话题或神话经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又被逐渐放大、延伸、推广，成为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想象。^①从鲁迅的小说和早期杂文的创作来看，确实贯穿着一个批判国民性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晚清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一书的传播，以及梁启超等晚清启蒙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阐扬，成为中国改革或革命的理论关注焦点。五四时期，鲁迅和其他启蒙主义者一样对这个话题也不妨“拿来”，但是这种“拿来”是诉诸自己的手和脑的。物事易手，意义自殊，昔日改革者的理念也须改革，外来传教者的说教必须内滤。我们必须从拿来而变其义的角度，动态地考察一个真实的鲁迅，考察他如何对改造国民性的命题也进行改造，借以作为提倡新文艺，对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逻辑起点。

脱离具体语境而谈论“X=Y”的似是命题，乃是比较文化中至为轻率而容易流于肤浅和迷误的做法。考察鲁迅对“改造国民性”命题之改造的具体语境，起码应该把握三个维度。其一，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固然来源于西方的国民性理论，也是接过晚清改良派的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讲，它最初发生于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界青年志士，筹措和实施其“新生”运动之时。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说：1902年2月，鲁迅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六年后发表《摩罗诗力说》，称“裴伦（英国诗人拜伦——引者注）大愤，极诋彼（希腊）国民性之陋劣；前所谓世袭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②鲁迅关注古国国民性中的奴性，由此

① 随着后殖民理论的风行，鲁迅的批判国民性思想也被推上被告席。有学者认为鲁迅秉承了西方的“国民性”话语，“在他的影响下，将近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问题产生了集体情结”。甚至有人怀疑改变鲁迅思想、触发他“弃医从文”的那张著名的幻灯片，也是鲁迅自己杜撰出来的，可见鲁迅国民性改造的动机之虚妄。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61页。2000年的“《收获》风波”中，冯骥才在其《鲁迅的功与“过”》中，又重复了这个话题，批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参见《收获》2000年第2期。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1页。

开始。他把这份愤慨赋予拜伦，乃是因为拜伦是他极其推崇的撒旦诗派的首席诗人，其“为独立自由人道”而战，“不克厥敌，战则不已”，“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从拜伦的“荡涤陋习”到鲁迅的“扫荡废物”，可以体验到这番话有夫子自道的某种意味。从改造国民性的第一声，鲁迅便赋予这个命题以“精神界之战士”的气质，这是所谓“殖民话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二，鲁迅笔下“愚弱的国民”的形象，并非来自一个不更世事的幼稚者随便扯来的空洞理念，而是来自一个深刻的思想者阅尽沧桑的亲身感受和现实观察，也来自他所抱的启蒙主义和“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真切，会使一个理念闪烁着幽邃的光。《阿Q正传》是长期沉默观察的结果，绝非某种观念的放大。鲁迅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① 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② 他以身经目察，来画国民魂灵，没有理由说他在制造什么神话。倒是有理由说，这是鲁迅直面人生，睁了眼看的发现。他批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当他指认“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时，他就呼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③ 这说明，鲁迅的启蒙主义虽受西方启发，却带有从中国社会深处走出来的浓厚的现实性，是一种深刻的现实启蒙主义。

其三，以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为代表的国民性理论，同鲁迅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灵魂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鲁迅确实提到过史密斯的这部大作，那是1926年夏他在北京东单牌楼买到日本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从目录就知其对支那民族性极尽丑化之能事，“他似乎很相信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日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

① 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18页。

②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2页。

③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241页。

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 Smith 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不知由于我们愚钝还是什么，从鲁迅的话中我们体验到的，倒是日本此君与美国这位传教士心有共鸣，而二十年前（1906）处于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期的鲁迅，却对史密斯的大作“不大留心”。鲁迅接着的议论却把矛头指向“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善于变化，毫无特操”，他们要面子，只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① 这些都是传教士不可能有的思想。由此可知，鲁迅与史密斯最大的不同在于出发点：鲁迅挖掘国民性是为了中国新生，是为了中国改革和革命，挺起民族脊梁；而西方的国民性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世界妖魔化中国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种舆论，令人怀疑是为入侵和掠夺中国，企图统治并奴役中国制造理论依据，这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百年中国饱受外族欺辱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事实。而且鲁迅说过：“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事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② 人们大可不必担心鲁迅吃了牛肉，就变成“牛肉鲁迅”。他不是照猫画虎之辈，而是充满原创精神的思想者，他的一条创造性思路就是把国民性问题纳入历史进程中，而不像传教士那样只作静态的欣赏和奚落。鲁迅指出：“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他既强调国民性改造的历史迫切性，又强调国民性改造的历史可能性，认为“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③ 百年中国国民性的进程，证明鲁迅是真正把握了历史潜流的有预见性的思想家，他的忧虑，他的慰藉，都属于历史。

① 鲁迅：《马上文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26～328页。

②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192页。

③ 鲁迅：《忽然想到》，《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8、139页。